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安全、合作 与共同体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

郑先武 著

安全区域主义，
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

东南亚区域，
以令人瞩目的成就，
成为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魅力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安全、合作 与共同体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

郑先武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 / 郑先武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 朱瀛泉主编)

ISBN 978-7-305-05749-6

I. 安… II. 郑… III. 国家安全—研究—东南亚
IV.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4606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朱瀛泉主编

书 名 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

著 者 郑先武

责任编辑 蒋桂琴 季 鹏 编辑热线 025-8359212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7.25 字数 432 千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749-6

定 价 54.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朱瀛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局面。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意于过去的“国际政治”。18 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当初创造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今 200 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知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而生长发展,是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同国家战略目标与和平发展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过去的 30 年间,我国这个领域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自觉有了显著的提高,一是增强了把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的意识,二是致力于建立学术研究与国际关系实践中新问题、新趋势的联系。这些努力使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保持了应有的活力。而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与外部世界交融的日趋密切,我们的学科建设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坐标上,创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已成为学术界共同的愿景。我们知道,世界政治是一个连续性和可变性并存的社会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任务不仅要说明国际体系是怎样变化而且要说明应该怎样变化,因而它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实践与命运、具有规范性研究特性的学科。美英等西方国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时间比较长,基础理论发达,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在学理上认真学习借鉴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特别是主流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经验及其对现代历史的理解构建起来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或思想判断上的偏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作为理论思维的指导,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化之路不能重蹈西方的老路,它完全有可能建立在将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结合并以此来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础上,以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规范要求。任何的学术进步和理论创新只有在扬弃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惟有循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才会实现共同的愿景。

这套丛书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依托国家 985 工程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而组织筹划,并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从 2009 年起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出版,既受泽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之优良学统的浸润,更得惠于丛书作者们之激奋于时代和国家

发展的感召。该丛书在意旨上以全球视域为基点,结合有关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着重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丛书内容丰富,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全球治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体性、20 世纪以来的国际史、全球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大国外交和战略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历史和现状三大方面的领域。我们希望,这套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丛书的出版,将对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事业有所帮助。是所望焉,谨此序。

2008 年 10 月于南京

目 录

总序	i
导论 安全区域主义理论化与东南亚经验	001
一、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的兴起	001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008
三、本书研究思路与方法	015
第一章 全球化与区域安全研究：概念重构	024
第一节 全球化与“区域”：概念重构之一	025
第二节 全球化与“安全”：概念重构之二	047
第三节 全球化与“安全区域”：概念重构之三	068
本章小结	086
第二章 安全区域主义研究：一种分析框架	089
第一节 背景条件：全球化与安全区域化	092
第二节 基本进程：发展的“连续统一体”	118
第三节 施动力量：多元行为体与复合关键变量	147
本章小结	179
第三章 全球化与东南亚“安全复合体”结构变化	180
第一节 历史考察：冷战、东南亚“古典安全复合体”与 军事-政治安全	181
第二节 新的变化：全球化、东南亚“异质安全复合体”与 综合安全	212

第四章 全球化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	252
第一节 历史考察：从霸权、均势到“防务共同体”·····	253
第二节 新的进展：“合作安全”与区域间主义·····	284
第三节 新的跨越：“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及其前景·····	329
第三、四章小结·····	351
结论 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理论、历史与现实·····	353
一、理论分析与综合解释模式·····	355
二、“路径依赖”与历史进程·····	359
三、现实“检验”与东南亚个案研究·····	362
四、安全区域主义的有效性和研究“难点”·····	369
后记·····	375
主要参考文献·····	377
索引·····	414

导 论 安全区域主义理论化与东南亚经验

一、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的兴起

本书以理论分析为基点,以东南亚为个案,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区域主义。进一步讲,它是试图通过探索“全球化”、“区域主义”和“区域安全”这三大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凭借区域主义去实现区域安全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这一理论的探讨是从全球化(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区域化)的关系开始的。目前,关于两者关系的争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体上支持全球化的观点,关注区域化是全球化的“绊脚石”(stumbling blocks)还是“踏脚石”(stepping stones),即区域主义是阻碍全球化还是有利于全球化^①;二是反对或怀疑全球化的观点,关注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及其被夸大的表象和区域主义在此背景下的客观存在,

① 该争论主要反映在经贸领域,基本上属于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内部分歧。参见 Pascal Lamy, "Stepping Stones or Stumbling Blocks? EU's Approach towards the Problem of Multilateralism versus Regionalism in Trade Policy", *The World Economy*, Vol. 25, No. 10 (November 2002), pp. 1399 - 1432; Percy S. Mistry, "The New Regionalism: Impediment or Spur to Future Multilateralism?" in Björn Hettne and András Innotai et a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9, pp. 116 - 154; 罗伯特·J.凯伯:《国际经济学》(第8版),原毅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年版,第265 - 266 页。

总体上认为区域化是对全球化的替代^①；三是承认全球化和区域化共存于同一进程中，认为区域主义是一种对全球化变革的持续的现实回应和防御性战略。^② 其实，对两者关系的理解，本质上取决于对两者的定义和对其基本特征的理解。就全球化讨论而言，目前主要有三个流派，即扩大论（hyperglobalizers）、怀疑论（skeptics）和变革论（transformationalists）。扩大论（又称激进的全球主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和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处于一个“全球时代”，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消亡，国际政府组织也正在衰落，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形成；怀疑论（又称非全球主义）认为，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扩大了，事实上，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更低，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一种国家与市场所推动的国际化（更多的是西方化和美国化）和区域化。在这里，国家和国际政府组织的力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加强。变革论（又称温和的全球主义）的观点大体上介于两者之间。^③

由于本书只是将全球化作为自己理论分析框架的背景来对待，所以，不对全球化理论本身作出具体探讨，而只是总体上接受“变革论

① 主要观点有：一是鲁格曼和赫斯特等人的“三方区域化”，即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三大贸易集团主导着世界经济。参见：阿兰·M.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对全球化及其商业影响的全新激进的分析》，常志宵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张文成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二是萨米尔·阿明的“区域化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极化的反应”。参见 Samir Amin, “Regionalization in Response to Polarizing Globalization”, in Björn Hettne et a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p. 54-58.

② 代表性著作是：Björn Hettne, András In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UNU/WIDER The New Regionalism Series*, Volume 1-4,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1999-2001;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③ 参见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陈志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p. 1-8; David Held et al., *Debating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者”的观点,把全球化看作“一个(或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这里的‘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跨空间和时间的流动,而‘网络’指的是独立的能动者之间有规则的或者模式化的交往、活动的接点或者权力的地点。”^①具体而言,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1)它不是单一的状态,而是一个或一组进程构成的具有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特征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其一端是以地方、国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网络,另一端是在区域和全球交往这个更广范围内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网络。(2)它具有空间广度和密度的全球和跨国相互联系,把共同体、国家、国际制度、非政府组织以及多国公司之间的关系编织成复合而互动的网络构成的演变着的结构,它不是限制着而是推动着共同体、国家和社会力量,从而重塑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3)社会生活几乎所有领域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从文化领域到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法律领域以及环境领域。(4)由于跨越了政治边界,全球化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空间的“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一方面,在全球化条件下,“地方的”、“国家的”,甚至“大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空间得到重构,因此,它不再一定与既定的法律和领土边界相一致。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它产生了社会、经济活动重新领土化的压力,其形式包括次国家的、区域的和跨国国家的政治经济区域、治理机制以及文化复合体。(5)全球化所涉及的权力组织和实施规模不断扩大,即网络和循环空间范围扩大,这致使国家政府的权力、功能、权威被重组或者重新调整;作为对全球化力量作出的单独或集体的反应,各种文明社会正以全球劳动和权力再分配的关键行为主体的面貌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权威不断分散到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的公共和私人代理机构手中,民族国家不

①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第22—23页。

再是世界权威的唯一中心或者首要形式。^①

正是基于全球化变革的上述背景,“区域主义研究回归到国际关系理论前沿”^②。学者们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称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以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轫于欧洲、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陷于衰落的“旧区域主义”(Old Regionalism)理论与实践。^③这导致学术界开始对“区域”、“区域主义”等重要概念进行重新界定(见第一章第一节),并对区域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目前,关于“新区域主义”流行的观点是,作为一种涉及多个领域的政治方案及行动,它是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妥协,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解决国家层次和全球层次难以解决的问题。从世界秩序观点看,它反映了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多侧面的关系,是对国家主义的一种超越,也是在对全球多边主义失灵的反应中的一种“积极的最佳措施”^④。他们相信,在既有的价值与社会共识可能更高的区域层次上谈判管理全球化所需的深度一体化和介入性规则更为容易,超越国家治理的政治问题也会更易于管理;对许

① 参见 James N. Rosenau, “The Relocation of Authority in a Shrinking Worl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2, No. 3 (April 1992), pp. 253 - 272; James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orden Wilkinson (ed.), *The Global Governanc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45 - 67; Robert W. Cox, “Beyond Empire and Terror: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ld Order”,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 3 (September 2004), pp. 307 - 323; Jan A. Scholte, *Globalization: An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征:转型与抵制、喜悦并忧虑》,刘得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约瑟夫·S. 奈、约翰·D. 唐纳胡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② Marianne H. Marchand, Morten Bøås et 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Region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1999), pp. 897 - 910.

③ “新区域主义”这一术语由诺曼·帕尔默最早提出,是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区域合作的新浪潮。此后,这一说法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参见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1.

④ Fredrik Söderbaum, “Introduction: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in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Palgrave Reader*,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2003, pp. 1 - 21.

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区域主义是其控制或谈判融入全球经济进程的组成部分。^① 总之,全球化大变革和新区域主义发展的现实使区域主义研究出现一条基本的共识:区域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现实性回应,也是对国家—民族主义需求的一种重要的延伸,因而它可以在国家—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这正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所言,因为“区域的影响经常居间调解国家和全球影响”,所以“它既不太热,也不太冷,而是正好合适”^②。

正是全球化变革和“新区域主义”双重理论与实践背景引发了对“安全”和“区域安全”等相关概念的重新界定(见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进而推动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研究和区域主义研究从原有的分离状态逐步走向融合,最终催生了国际关系领域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安全区域主义”(security regionalism)。这就是本书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主要背景。

然而,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区域主义的分析框架不能仅仅依靠理论的界定,它还必须有经验性的观察作为例证。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话说,“正是我们生活所处的恐怖困境迫使我们去寻找走出困境之途”,而“寻找走出困境之途的需要意味着国际关系必须既是一种理论活动,也是一门政策科学。我们应该致力于理论联系实践……以仔细精确的方法瞄准当代问题”^③。区域主义和安全研究具有显著的政策相关性,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显得更加重要。弗雷德里克·索德尔伯姆(Fredrik Söderbaum)谈到新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强调:“如果缺乏理论,就很难系统地和科学地思考国际关系和区域主义。当我们理解和建构新区域主义理论时,我们将能够自觉地理解更多的新区域主义现象本身。事实上,对绝大多数研究者

① Andrew Hurrell, “The Regional Dimens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p. 42–43.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 in Shaun Breslin, Christopher W. Hughes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04.

③ 罗伯特·O. 基欧汉:“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载罗伯特·O. 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至少是理论家们)来说,这是同一硬币的两个侧面。”^①霍尔蒂(K. J. Holsti)谈到安全研究时强调:“该领域是一种应用性科学。在这里,诊断与处方的关系是清晰而强有力的。”^②詹姆斯·赫恩兹(James J. Hentz)说得更加明确:“安全研究是关于真实世界的学科。”^③肯·布斯(Ken Booth)也强调:安全研究者之所以关注理论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理论解释世界’),以便更有效地与世界建立密切关系(‘没有什么事情比好的理论更有用’)。一句话,我们绝大多数人对理论感兴趣是因为我们对真实地方的真实的人们感兴趣”^④。

鉴于此,本书在总结出一种安全区域主义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引入东南亚个案研究,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互动来审视该框架的现实性。本课题以东南亚作为理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有国际公认的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的区域主义实践:有发展中国家中历史最长、发展水平最好的区域组织——东盟,有从首个区域组织(1961年成立的东南亚联盟)成立以来成员国之间未出现大规模暴力的良好记录,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具对外拓展能力和意愿的区域间主义战略(如寻求分别主导亚太区域安全合作和东亚合作的“东盟区域论坛”、“10+3”合作机制和东亚峰会等),在世界上首次把最理想的区域秩序理论模式“安全共同体”写入区域主义发展战略(2003年10月签署的《巴厘第二协议》决定在2020年建成“东盟安全共同体”)。二是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里最缺乏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区域主义的实现条件:没有现实主义者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国领导”,没有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高度相互依存和民主化,没有制度主义者所说的高度区域制度化合作,没有全球主义者所说

① Fredrik Söderbaum, “Introduction: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p. 2.

② K. J. Holsti, “Scholarship in an Era of Anxiety”, 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 - 199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5.

③ James J. Hentz, “Introduction: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Theory of Security Studies’”, in James J. Hentz and Morten Bøås (eds.), *New and Critical Security and Regionalism: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 8.

④ Ken Booth, “Beyon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in Ken Booth (e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p. 272.

的高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趋同性或同质性等等。这正如诺曼·帕尔默(Norman D. Palmer)所言,因为“东南亚是整个亚太区域也确实是整个第三世界中最主要和最具活力的区域组织——东盟的摇篮和故乡,它值得被所有的区域主义研究者——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来进行特殊研究”。他认为,东南亚是“一个使用新区域主义理论进行分析的最动人的地方”,并正成为“一个研究世界性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国际主义并存现象的重要实验地”^①。遗憾的是,目前,尽管关于东南亚的资料非常丰富,但仍旧以非理论研究为主,刚刚兴起的东南亚区域主义研究更是如此。所以,对新区域主义和区域安全理论而言,这里既充满理论适用性的“挑战”,又充满理论发展的“机遇”,而正是这种并存的“挑战”与“机遇”,最有理由测试、修正和发展现有理论!

本书对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区域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主要意义有三:一是对国际关系学界零碎的安全区域主义理论观点进行一定的梳理,使其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二是探索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安全区域主义的整体理论模式;三是期望能为中国安全区域主义的实践提供一种指导。近年来,中国政府已正式启动安全区域主义战略,并将之作为区域多边外交重点之一,如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东南亚是发展中国家中开展区域主义最成功的区域之一,又是我国的近邻,更是我国中短期区域合作的主要对象(如已启动的“东盟区域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东亚“10+3”合作机制、东亚峰会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与合作条约》等)。所以,适合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理论模式与中国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由于中国的安全区域主义实践尚处于初级阶段,仅仅进行一些以现状为主的经验性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杨伯江先生谈到东亚区域合作的障碍时指出,“明显缺乏适用理论的有效指导”是其重要弱点。^②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区域安全研究需要一种真正能够体现出该区域自身动力的理论方法。这样,探索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安全区域主义发展道路,是稳定中国周边环境、推

①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p. 19, 30, 61.

② 杨伯江主持:“东亚一体化可行性探讨”,《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6期,第50页。

进和平发展战略的现实要求,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意义。这正如东南亚研究专家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言:“毋庸置疑,东南亚已成为关于区域关系,实际上也是关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理论化的重要场所。当然,所建构的这些理论也可以有效地应用于世界上的其他区域。”^①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本书的理论研究涉及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区域主义的全球宏观和东南亚微观两个层次。下面就简要谈一下国内外学术界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对这一专题相关的研究状况。

(一) 国外研究状况

就全球宏观层次而言,本专题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目前的研究主要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对安全区域主义发展进程及其动力进行综合研究。就其进程而言,目前已达成一种共识,即它是从“安全复合体”开始(理论起点),经由其他区域安全安排或安全机制(中间阶段),最终到“安全共同体”(理论终点)的“安全连续统一体”(security continuum)。学者们对其发展动力进行层次和领域分析,形成了全球、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和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领域的互动模式。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分别是:巴瑞·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æver)及其著作《安全新论》和《区域与强权》、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和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 Morgan)及其主编的《区域秩序》、穆斯安·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及其主编的《亚洲安全秩序》、比约恩·赫特纳(Björn Hettne)及其专论《区域主义、安全与发展》、克雷格·斯奈德(Craig A. Snyder)

^① Amitav Acharya and Richard Stubbs, "Theorizing 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2 (June 2006), p. 133.

及其专论“区域安全结构”等。^①但他们没有详细阐述推动这一进程的具体的行为主体和关键变量。二是对安全区域主义进程的不同阶段、不同行为主体和不同关键变量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明显处于分散化状态,即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视角对之进行了各自的研究。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权力尤其是大国权力的作用和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并把军事威胁作为主要动力,所以,他们主要关注传统的军事安全和国家主导的均势、霸权、联盟和大国协调等安全秩序模式;^②自由主义者除了和现实主义者一样关注国家主导的军事安全议题外,更关注经济相互依存、民主、自由、制度的作用和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与合作关系,更强调国际组织等正式的安全制度,尤其是集体安全制度和“民主安全

-
- ① 参见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s: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jörn Hettne, András In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pp. 1-53; 克雷格·A. 斯奈德:“区域安全结构”,载克雷格·A. 斯奈德等编:《当代安全与战略》,徐纬地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146页。
- ② 参见 David A. Lake,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 System Approach”; Paul A. Papayioanou, “Great Powers and Regional Orders: Possibilities and Prospects after the Cold War”; Richard Rosecrance and Peter Schott, “Concerts and Regional Intervention”, in David A. Lake et al. (eds.), *Regional Orders*, pp. 60-66, 125-139, 140-143.